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1966—1968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派系冲突（上）	魏昂德
【微观历史】	清华文革中两派分歧的一个微观样本	张比
【史海钩沉】	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小报	胡庄子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1966—1968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派系冲突（上）

• 魏昂德 •

（译者：严飞）

（摘要：在1966年夏天之后的两年间，北京大学里充斥着派系斗争和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尽管派系对抗十分严重，但两派的对立并未涉及到政治纲领或政治取向上的分歧。聂元梓，作为一名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的老党员，通过指责旧北大党委和工作组而在组织地位上获得迅速提升，其后又通过打击先前与其结盟的战友所领导的反对派来保护自己正在扩张的权力。当两派的互相指责不断强化的时候，妥协已不再可能，高层的干预非但没有促成妥协，反而加深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分化。冲突的结果是痛苦的，不仅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而且更是因为对抗双方相互了解，彼此存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斗争失利的结果却十分可怕。）

从1966年到1968年之间中国社会被派系冲突撕裂，并逐渐演化成武装冲突，这种情况直到戒严施行之后才停止。冲突的广度和强度表明派系冲突是深深根源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对于不同派系的区分，一般是通过大家通常认为的各派系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现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保守派一般被认为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认为党组织的传统和制度是基本合理的；相反，造反派则被认为是用斗争的眼光看待现存制度（1）。一些学者则注意到派系冲突更多地是为了权力而不是原则或者政策，因此并不急于为两派的分野做出总括性的区分（2）。

许多学者推测各派系拥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保守派应该吸引了那些当时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造反派则应该包括了当时相对弱勢的群体（3）。这一解释是在对特定群体的研究中发现的，并且在某些著名的事件中得到了验证（4），例如上海的“赤卫队”在1966年秋天通过工会动员工人们反抗造反派的攻击以保护上海市委（5）。在中学里，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则是以来自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为主，他们反对对高级别的党组织官员进行攻击（6）。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震中，其红卫兵组织亦经历过剧烈的内部分化。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北大1966至1968年间红卫兵派系的斗争仍然缺乏细致的研究，直到最近一批新资料的公布，才使得重建工作得以变得可能，这包括派系的起源、领导者的身份、双方争论的本质以及冲突升级的过程〔7〕。令人惊讶的是，冲突双方在领导层面和政治取向上是相似的，在政治策略和个人品性上虽然差异显著，但在教义和纲领上却没有足够大的差别以将他们区分为保守派或造反派。一旦北大内部的派系与北京市其他群众组织结成联盟，并陷于高层政治家的操纵之中，两派的界限就会被强化，伴随而来的是暴力的升级。这段简短的历史表明派系之间的暴力冲突是一种权力争夺之下派别利益的激烈对抗，而非中国社会结构性分化的表现。

一、1966年5月25日的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发生了一起通常被视作文化大革命精神浩劫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聂元梓和6名哲学系同事指责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干部宋硕与彭珮云阻碍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尽管这张大字报被视作红卫兵运动的先驱，但是7位作者中没有一位是学生，相反，他们都是干部或者是马列主义政治讲师，七人中除一人外其余均是老党员〔8〕。

聂元梓是7人中的核心，她是一位与上层精英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年干部。作为学校的党委会成员，她是学校的30名高层干部之一。在那时，她刚45岁，嫁给了比自己年长23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官员〔9〕，她与她的丈夫经常与部级官员交往〔10〕。她的哥哥聂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并且娶了刘少奇的前妻。她的大姐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委宣传部工作，并与该部门的副部长结婚〔11〕。1938年，还是中学生的聂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后在延安学习和工作。尽管她从未完成过高中学业，但却参加过许多干部学校的学习。50年代，她在哈尔滨党委工作，并嫁给了时任哈尔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吴宏毅。1959年末，聂与吴离婚后调任到北大做经济系副主任直到1963年，之后她被调任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2〕。

聂的那张著名大字报使得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就出现的党内分裂再次出现。1964年七月，康生命令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进入北大进行调查〔13〕。在找了一些从50年代起就对北大校领导不满并与之发生冲突的干部和教师谈话之后，他们得出结论：有很多“政治上不纯洁分子”和“外国间谍”活跃在北大〔14〕。1965年1月，张开始对阶级敌人进行批斗，其中包括很多有资产阶级背景、家庭成员与海外或国民党有联系的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15〕。这一行动在许多工作组成员和北京与中央党组织成员看来有些过分了，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工作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之后，一场争论随之升温。邓小平同意彭真的意见，他批评了康生，并认为北大和陆平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同时要求工作组进行纠正〔16〕。

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激进的工作组和工作组的支持者，他们被批评为犯了“左倾错误”。北大的社教运动积极分子聂元梓、哲学系教师孔繁、杨克明、张恩慈、孙蓬一和其他人被迫进行自我批评〔17〕。对他们最厉害的批评来自于工作组副组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18〕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以及在宋的部门工作的彭珮云〔19〕。北大的“左派”蒙受了耻辱，纷纷要求调离北大工作〔20〕。

1966年5月，康生精心策划了聂元梓对陆平的批斗。1966年5月5日，不久前刚调到中央理论小组的张恩慈，提交了一篇《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的文章，

并在文章里提出要求中央推翻对社教运动的定论。康生将文章转送给了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正远离北京出席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被打倒。5月11日，毛将此文章重新打印，并批示转发党的领导层传阅（21）。三天后康生派遣了一个调查组进入北大，并鼓动北大对陆平进行批斗。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领导了这一由在社教运动中反对陆平的成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小组（22）。起初调查组试图动员北大党委常委陈守一，但遭到了陈的拒绝（23）。于是调查组转向了聂元梓（24）。聂很合适，她在1965年末就向毛泽东提交过一封书信，抗议工作队利用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但后来却抛弃他们的行为（25）。巧合的是，仅仅数周前，聂向康生汇报了安子文向其情妇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她怀疑安的情妇是一名间谍。由此，她与康生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康指示聂继续监视安及其情妇并定期向他汇报（26）。出于社教运动的经历，在亲眼见到五一六通知和得到曹的保证之后，聂才同意对陆进行批判（27）。

陆平的支持者起初谴责聂是搞反党阴谋（28），学校的高层领导由此分裂开来。两个有实权的人——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和常委崔雄崑站在了聂的一边。他们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责陆平意图“阻碍革命”，并且要求再派遣一支工作组到北大（29）。6月1日毛泽东突然命令全国公开播出聂的大字报，这一问题才得到了解决（30）。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突然接到调令，任命他领导一支新的工作组。他于6月1日晚抵达北大，并宣布陆被革职，新的工作组即将进驻（31）。

二、北大工作组

对于聂和她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胜利。曹成为工作组的副组长以及工作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32）。反对陆平的社教运动工作组成员刘仰峤和在大字报事件中站在聂一边的北大党委常委戈华、崔雄崑成为了小组领导成员。聂则出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张恩慈居副。帮助起草大字报的杨克明成为负责宣传的副主任。社教运动中作为聂的盟友的哲学系教师孔繁则进入了工作组政策调研组（33）。

工作组采纳了社教运动中被整肃者的意见，将斗争对象转移到了那些出身背景不良和有海外关系的校领导身上，以及在早期斗争中站在陆平一边的人（34）。到七月上旬北大领导层整个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二十名总支书记中，只有聂元梓一人被认为是可靠的，16人被界定为阶级敌人。不到百分之八的干部被认为是没有犯过错误的。据说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了错误，这些错误严重到可以开除他们的职位（35）。只有三分之一的干部从这种痛苦的考验中挺了下来。

尽管较为激进，在七月底工作组还是突然撤离了，组长张承先因意图阻碍学生运动而受到批评。在宣布可以公开批判北大党委和校领导之后，工作组发现学生更加难以控制了。斗争不断扩大，在批斗大会上，遭受批斗的人被迫戴上高帽子，脖子上被挂上批斗牌，在会台上被肆意推搡。他们的头发被撕扯，手臂被反绑，还要跪成“喷气机”的姿势，他们的身上被贴上大字报，有时候甚至还会遭受严重的殴打。根据工作组的统计，到6月17日，有178名干部、老师和学生遭到这种迫害；其中一次批斗之后，一名历史系的副系主任选择了自杀（36）。

工作组的负责人试图阻止这种乱揪乱斗的混乱。6月13日，在一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张承先呼吁保持克制。（37）然而在6月18日，暴力事件还是在全校范围内爆发了，大约70名干部和老师被拖上讲台，脸上被涂抹墨汁，在批斗过程中遭受到拳打脚踢。其中6人是党委常委，41人是党委成员、总支书或总支委员会成员。（38）工作组在全校范围内展开工作，制止批斗，救助受害者并为他们治疗。（39）

当晚张承先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指出白天的暴力事件是被四名“坏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利用学生的革命热情借机制造混乱，张还承诺进行进一步的调查〔40〕。次日工作组提交了一份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报告，谴责“坏分子的反革命阴谋行为”。6月20日，这一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抄给全国各地党委，中央秘书处批示工作组的行动是“正确且及时的”。〔41〕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则敦促出台更严厉的措施。6月21日，曹轶欧呈交了第二份报告，认为这一事件是一起由校内外敌人共同策划的阴谋〔42〕。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于6月底访问北大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阴谋理论。他认为“六·一八”事件是起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挖出来，结果导致另外24名学生牵涉其中。〔43〕

毛泽东在其著名的长江畅游之后，于7月18日回到首都北京，并表达了他对工作组工作方式的不满。这之后，“六·一八”事件出现了新的含义〔44〕。毛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陈伯达的新观点：工作组在压制学生方面反应过度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传达他的观点并且命令工作组于7月21日撤回〔45〕。转向的消息立刻传到了北大，张承先在7月18日的广播里做了自我批评。但是这太迟了：第二天聂元梓就利用学校的广播系统指责张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46〕。随后，大肆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47〕。

几天之内，中央文革小组就对此进行了公开的干预。江青在陈伯达的陪同下，于7月22、23日两次来北大调查，会见了聂及其支持者并且表扬了他们的立场。陈伯达（修正了他原先的意见）宣称，按他“个人的观点”，“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48〕。7月25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展开批评〔49〕。第二天晚上，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又在北大召开，矛头直指张承先〔50〕。陈伯达要求工作组撤退，江青建议应当成立一个由聂元梓领导的委员会取代工作组〔51〕。两天后，一个北大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选举成立，聂担任主任〔52〕。

有了高层支持，聂随即巩固了她在北大的地位。她组织了对张承先连续三天的大规模批斗。康生和江青参加了8月4日的批斗大会，这次会上，张承先被拖上讲台，戴着高帽，弯着腰，手臂伸展成“喷气机”姿势，并且遭到了来自北大附中两名学生用皮带的抽打〔53〕。8月份，聂元梓频频会见曹轶欧、江青，特别是受命监督北大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康生也给聂送去了书面指示〔54〕。在此期间，聂会见过毛泽东一次，其后，毛应聂的请求为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题字〔55〕。抄家行动愈演愈烈，自杀事件更加频繁〔56〕。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在8月19日聂主持的一次大规模群众大会上，一个红卫兵组织终于建立了起来〔57〕。像大多数老红卫兵组织一样，这一组织也是由来自革命家庭的后代所组成〔58〕。

9月9日，〔42〕人被选举组成北大文革委员会。聂及其哲学系“战友”占据了其中六个席位。聂担任主任，孔繁担任第一副主任〔59〕。行政职位主要由哲学系的中坚分子所占据：杨克明主管宣传并担任了8月22日所推出的第一期《新北大》的编辑〔60〕。随着聂权力的巩固，她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在北京的其它大学里，造反运动源自于反对学校工作组的少数派。从1966年8月到10月，他们试图推翻和工作组合作的多数派〔61〕。北大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直到工作组撤离数日前都没有出现对工作组的明显反对，而且聂和她的“战友”曾和工作组紧密合作过。聂自己也从未领导过任何的造

反运动：她仅仅是在中央文革撤除了工作组之后才获得了领导权。和北京其它校园里由少数派进行的斗争相比，聂和她“战友”的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

三、造聂元梓的反

10月份，两个互为独立的事件共同促成了北大的倒聂运动。第一个是对于聂试图控制红卫兵意图的抵制。第二个是北大老左派们之间的分裂。对聂不满的红卫兵和与聂分裂的老左派联合了起来共同反对她对学校的权力控制。这时聂所处的尴尬地位已经非常明显了。她批判张承先的工作队压制学生运动，但当她自己进行权力巩固时却不得不面临着同样的指责。8月中旬聂建立起北大红卫兵组织之后，类似的红卫兵组织也开始扩大。到10月中旬，校园里已经出现了三个大的红卫兵组织，大约3000名北大学生组成了92个大小不等的独立的红卫兵群体〔62〕。到这个时候，他们总共进行了536次抄家以及不计其数的审问和批斗大会〔63〕。为了维护权威，聂又建立起院系文革委员会和统一的红卫兵指挥部。她任命本院系的干部、政治教师孙蓬一领导红卫兵组织〔64〕。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必须统一到孙的领导之下，并选举新的领导者，同时要求跨院系的政治行为必须停止〔65〕。

这一试图控制红卫兵的举措马上遭到了两大红卫兵组织的挑战。他们反对上级强压的联合令并拒绝参加大联合〔66〕，并形成了第一波倒聂的浪潮。10月上旬，两个物理系学生帖出大字报批评聂的领导并要求她下台。他们指责选举是无效的，候选人名单早已内定，而另一方面却有超过3000名校外人员无法参加投票，所以所选举出的领导人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他们指责聂利用学校的宣传机构不断宣扬“五·二五”大字报来提升自己的声望〔67〕。他们贬低她的“造反”行动，指出她的大字报是在“五·一六”通知之后十天才出炉的，那时候彭真已被处理、对社教运动的批评转向亦很明确。最后，他们指责聂忽视不同意见并且压制批评者〔68〕。一场“大辩论”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轰轰烈烈的展开，一方是支持聂的校文革委员会，另一方则指责她“镇压群众”的方式和工作组同出一辙，并且在实行“资产阶级秘密反动路线”〔69〕。

杨勋是经济系的一位教师，她的一篇批判性长文表达了学校里许多人对聂的不满〔70〕。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参加过八路军，因为聂早先在经济系工作的关系而对聂很熟悉。此外，杨曾经是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与聂一起对陆平进行过批判，还入选过早先的校文革筹备委员会〔71〕。杨指责聂的领导小组不仅过于沉溺于自我崇拜而令明智昏、忘乎所以，而且攻击异议者并使得整个红卫兵运动趋向官僚化。杨指出，聂作为领导者，曾经和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走到了一起，但是聂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要为这些承担责任并检讨自身错误之心。

《新北大》上公开发表这样的批判文章表明反对派在校文革委员会中有同情者——特别是第一副主任孔繁和《新北大》的编辑杨克明，他们都卷入了“五·二五”大字报事件。10月24日，当聂在几名反对者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常务委员会，要求增加新的支持者进入小组并且任命孙蓬一负责所有文革活动时，最终的分裂产生了〔72〕。接下来的一周里，杨克明被解除了《新北大》编辑的职务，关于聂的“大辩论”宣告结束。在11月5日的那一期杂志中，杨勋被批评为“机会主义者”，结果这导致了聂的反对者冲入编辑办公室关闭杂志出版长达一个星期时间〔73〕。

“老左派”们这些公开的分裂使得派系之间的联盟愈发明朗化：孔繁和杨克明加入了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团体，而先前支持聂的力量在校文革委员会和孙蓬一领导的红卫兵组织下得到了联合。几个反对派团体成立了，一个由聂的拥趸组成的组织也建立了起来〔74〕。

反聂派指责聂在执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压制群众组织，打击批评者，并且试图控制和阻碍群众运动。相反，拥聂派则指责反对派在走“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并营造出聂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和“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铁血逻辑〔75〕。

就在聂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浪时，她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11月中旬，应毛泽东的要求，聂率领一个北大代表团前往上海支持那里正在进行的炮轰上海市委的造反运动，并且鼓动对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平进行攻击，常是社教运动工作组整风的对象〔76〕。聂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12月中旬回到北京后又把其在上海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汇报〔77〕。

一回到北大，聂就开始打压她的反对者。12月12日，拥聂派抓住了杨勋、杨的弟弟杨炳章和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并把他们打作“反革命分子”〔78〕。聂诬蔑她的反对者是属于炮打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从而得以借口大规模排斥和打击异己。数天之内，反聂组织的办公室就被强行关闭了〔79〕。

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紧密联系使得她能够挡开那些认为她是“保守派”的人。1966年12月29日，她的校文革委员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场针对整个北京市委领导层的大规模群众批斗大会〔80〕。在这一期间，她多次与江青和康生会谈。江和康重申了他们对聂的支持，并且肯定反聂派都是“反革命分子”〔81〕。12月24日，聂在北大的一个群众集会上给诸多反对者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并且呼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82〕。杨勋、杨炳章和乔兼武被逮捕入狱〔83〕。1月10日《新北大》认定聂的两个前“战友”孔繁和杨克明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84〕。江青则称他们是“刘—邓反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并且号召“砸烂他们的社会基础”〔85〕。在1月17日，聂的反对者都被镇压了，聂则正式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86〕。

四、天派与地派：全城反对聂元梓

尽管如此，反对聂元梓的浪潮很快又重新出现。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对聂不愿妥协的作风逐渐感到不耐烦，随着时间的推移，聂与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87〕。与此同时，其它大学的造反组织也对聂心存不满。1月下，江青在与造反派领导人的一系列会面中重申了她对聂的支持；江还警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不要对北大的反聂派表示同情，并且表态要保聂。江承认聂的缺点和错误，但也强调在斗争中他们实质上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88〕。

江青对聂的支持有更大的策略性目的：聂是江要仿效上海一月夺权在北京帮助其夺权的一枚重要棋子。1月18日，聂会见来自各大学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名为北京公社的组织来准备在中央各部委和市政府进行夺权〔89〕。作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北大拥聂派被并入一个新的组织——新北大公社〔90〕。但是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各自为政，缺乏联合，他们匆忙地抢夺政府部门的权力，结构导致整个夺权行动一片混乱〔91〕。创办北京公社的想法在二月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联合了革命学生、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的革命委员会〔92〕。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聂担任核心组组长〔93〕。至此，红卫兵运动被统一在了一个新的联合了学生、教师和干部的学校权力机构之下〔94〕。

试图把不同派别的造反派联合在一个单一的指挥体系下面面临着根本性的困难。建立一个跨校的联盟体系不可避免地将会与各校之间的派性斗争发生冲突。从一开始，聂和新北大公

社就与其他造反派组织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矛盾。一月份，拥聂派夺取了高教部的权力，但是，另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领导的造反派组织也于同期进行了夺权，两方随后爆发了关于支持教育部哪一个派系的争论。谭支持一名在造反派组织中担任负责人的教育部干部，但是拥聂派却指责这名干部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不幸的是，对于聂来说，谭代表的是《红旗》杂志以及中央文革林杰、王力、关峰和戚本禹等人的观点，他们都支持这名干部。很快王、关、戚纷纷打电话给聂施加压力，但是聂拒绝让步，最后在陈伯达的干预下她才选择妥协（95）。2月15日，类似的冲突在争夺“黑材料”时再次发生（96）。这些冲突，以及冲突所蕴含的派系对立，最终在北京造反派运动的两翼——天派与地派——的矛盾对立中完全展现了出来（97）。

这些裂痕自从建立北京公社的意图落空之后就开始形成，而首都红代会于二月下旬成立后裂痕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98）。事实上，首都红代会刚成立后不久，中央官员就已经担心这一组织只是在形式上有个空架子，其领导层依然各自为政、内讧不息（99）。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一方得到了地院东方红的支持，另一方则得到了来自新北大公社的增援。双方都有伤亡（100）。当晚，聂元梓和蒯大富以首都红代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呼吁停止敌对，要求所有外部组织撤离（101）。

这次冲突激化了北京造反派们对聂的怨恨。地院东方红立刻谴责红代会颁布的命令并未经过核心领导层的讨论（102）。4月11日，地院东方红会同北师大井冈山和其它造反派组织，冲进北大进行游行、示威，并要求北大把聂从首都红代会开除。新北大公社则向附近的盟友清华请求增援，结果再一次导致了大规模武斗事件（103）。4月12日晚，公安部长谢富治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布紧急通告，命令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104）。冲突就此停止，但是红卫兵运动的裂隙却进一步加剧。至此，首都红代会已达到了公开的分裂。

然而聂并没有停止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四月中旬，康生让聂组织调查组，对先前已挨过批斗的旧北京市委进行系统的调查，聂召开了几次针对他们的大规模群众批斗大会（105）。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被任命为副主任（仅次于主任谢富治）。

权力得到膨胀之后，聂开始对北大的行政架构进行重建。5月初，聂召开了几次会议，会上要求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对聂的校文革委员会宣誓拥护以此表示他们对革命的支持。5月底，两名前北大党常委，崔雄崑和副校长周培源，相继作了检讨并表示拥护聂的校文革（106）。

尽管政治上步步高升，但是聂仍然无法压制有组织的反对声浪。“天派”与“地派”之间的矛盾分裂为北大的反聂派提供了与校外力量结盟的契机。3月3日，在一次加强对聂拥护的整风运动中，校文革委员会产生了新的分裂。哲学系教师郭罗基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聂自从掌权以来的种种专制行为，并要求从聂开始，对领导机构进行调整（107）。不久前被提拔到常委会的两个人——侯汉青和副主席徐运朴——和郭站在了一边（108）。5月底6月初，新的反聂联盟出现了（109）。

中央文革小组对聂的支持有开始动摇的迹象，这推动起新的一波反聂浪潮。3月底，就在校常务委员会产生了新的分裂之后，陈伯达和戚本禹去了北大，并且向学生表示“炮打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是错误的。陈说“你不能随意地说反对你就是反革命”（110）。陈和戚离开北大后，聂在一本刊载有陈谈话的小册子（毋庸置疑，反聂派受到了它的鼓励）中对此说法表示了质疑，并且召开会议批判这一“新的黑色路线”（111）。

1)。北大4月武斗事件发生后，江青要求聂元梓就她在冲突中的角色以及拒绝谢富治的调停行为进行自我批评（112）。聂与谢富治的幕后冲突持续到了第二年，因为聂坚信谢和支持谭厚兰及“地派”的戚本禹、王力、关峰一样，都是指示北大红卫兵攻击她的幕后主使人（113）。随着聂的地位下降，6月5日陈伯达再次来到北大强调了他对聂的批评，几天以后陈打电话给聂，表示并未因聂的攻击而感到受冒犯（114）。谢富治敦促聂在这一问题不要较真：目前的任务是团结所有造反派组织，而非制造冲突。作为回应，《新北大》号召进行一场整风运动，对东校文革内某些领导人最近所犯的错误进行纠正（115）。在一篇哲学系师生写的批判聂的文章里，聂被指责为利用组织进行派系斗争从而造成了左派之间的分裂（116）。《新北大》在随后几期里表示欢迎来自左派的批评，但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一次“二次革命”（117）。

反聂派并没有接过这一橄榄枝，反而是加强了他们的攻击。7月3日，反聂派结成联盟，并很快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期刊物《新北大报》（118）。《新北大报》刊发了一则“革命干部”大叛变的消息：一封由周培源和其他134人联名签署的公开信指责校文革自1967年3月以来就犯了路线错误，而反对派则立场坚定，值得表扬（119）。此时，分裂已难以消弭。7月10日，陈伯达发表声明，解释说他对聂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支持聂。7月中旬，聂不得不放弃之前的安抚路线，转而指责反对派是从“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舆论以密谋夺权”（120）。

五、僵局

高层的干预并没有促成双方之间的妥协，反而是加深了派系的矛盾分化。7月底，39个造反组织组成了一个新的反聂联盟，并在七所大学里设立了办公室。8月17日，五个大的反聂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且于第二天就被接纳进入首都红代会（121）。在庆祝其建立的群众大会上，来自红代会、工代会和中等学校红代会的45个组织表示了他们的支持，“五·二五”大字报作者之一的李醒坐在大会上发了言（122）。聂在“天派”的两个重要盟友——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也都发去了贺信（123）。如果不是聂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内某些重要人物的极度不欢迎，这些都没有可能发生。尽管机会不大，聂还是发起了反击，但是只有在获得江青的支持后才有起色。9月1日，江青对北京市革委会讲话，批评了聂的诸多错误，但是坚持应保留其职位，并且称呼聂的反对者为“坏分子”。9月16日，江更进一步谴责反聂者是试图翻案的“老保”（124）。《新北大报》则反驳说聂是一个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派（125）。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其它造反派组织的证实：老三司在其文告中指出，反聂派都是革命的，并非像聂所指责的那般为反革命（126）。井冈山兵团则指出，真正庇护“老保”的正是聂本人，并且提醒所有人注意她在工作组的角色以及她的那些“战友”们可疑的政治背景（127）。尽管聂指责那些反对她的人都是试图翻案的“老保”（128），但事实上双方都在积极拉拢早先的那批干部到己方阵营。早在三月份，聂敦促革命干部向其表忠心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了，但是周培源和其他134名领导干部的“叛逃”使得反对派占据了上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一派都嘉许他们的支持者为“革命干部”，而谴责那些向另一方效忠的人为“老保”和“反动派”。

从戈华和崔雄崑的例子，就可以很生动地看到两派立场的这种相似性。这两人都曾经是北大党常委，在“五·二五”大字报事件中他们都和聂站在一边。1967年3月，崔雄崑和文革委员会站在了一起，到11月底，他已经是重组北大党组织筹委会的二把手（129）。戈华则加入了反对派，并像聂原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一样被颂扬为“革命干部”（130）。十月上旬，聂派要求揪出戈华，指责他为井冈山兵团背后的“黑手”并要求他接受批斗（131）。12月3日，他们终于抓住了戈，并进行了审问和批斗（132）。

作为报复，井冈山兵团抓住了崔雄崑，指责他是北大资本主义路线的设计者，并对他进行了群众批斗（133）。

1967年底，更高当局终于对造反运动的派系分化失去了耐心，要求各派系把分歧放到一边。北京卫戍区指挥部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派系领导人都被要求进行再教育以解决他们的分歧（134）。但是在北大，两派对参加学习班的条件发生了争论。聂要求反对派承认她的校文革委员会作为北大官方权力机构（135），反对派则反驳认为校文革委员会必须重组以代表双方的力量（136）。市革委会试图打破僵局，于是裁定北大文革委员会是官方权力机关，新北大公社可以吸收井冈山兵团进入（137）。随后《新北大》宣布了重组北大党组织的计划（138）。

这些干预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双方的互相指责逐步升级，直至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遣了一支军宣队前往调停。他们坚持要求聂放弃对她先前同伴的反革命指责。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口授了妥协条件：井冈山兵团必须承认聂的校文革委员会为北大官方权力机构；校文革委员会也必须承认井冈山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双方要协商解决在北大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解放军支左不支右，无论哪一个派系都不支持（139）。井冈山兵团接受了这几点原则，因而最终得以获得军队给予的部分权力。但是聂却向党中央抱怨李钟奇的提议，并且询问这是否代表了中央的意思（140）。她坚持认为两派分裂是由反对派的反革命阴谋所造成的（141）。聂的立场得到了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他们继续破坏任何妥协的努力。康生3月份在和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派系斗争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江青也号召“天派”要“揪出”“地派”背后的“坏分子”（142）。僵局持续着。

六、冲突：1968年的升级

1968年3月20日，僵局被打破。当晚数名“地派”成员冲进校园，谴责聂元梓是反革命、孙蓬一是“小爬虫”，北大井冈山也加入了。作为回应，聂组织了一支民兵队进行“武装保卫”。三天后，超过1,000名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红卫兵开进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第二天又有大约10,000多名来自其它学校的红卫兵加入了他们的示威队伍。最后在校园里发生了武斗。谢富治和吴德赶到北大，广播要求外校学生撤出，并要求北大两派在聂元梓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几百名地院东方红的红卫兵还是手持木棍闯入北大，再一次与聂所统领的红卫兵发生了武斗（143）。

3月28日，北大两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武装械斗，械斗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拂晓，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发表广播讲话，要求械斗双方立即停止武斗并进行谈判。当李陪同聂前往井冈山总部制止武斗时，他们遭到了袭击——李的头上被大棒打出了一个包，聂则头部受伤出血（144）。这次袭击明显改变了当局对反聂派的看法。第二天早上双方最终坐下来谈判时，谢富治除了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之外，还批评了井冈山兵团顽固批斗聂元梓的行为是错误（145）。

这使得形势转向对聂有利。4月8日，《新北大》谴责井冈山兵团违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4月11日，在一份连同北京市革委会和公安部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又再次重复了这一指责（146）。在得到当局的明确支持后，聂于4月24日在一次于校内举行的北京各界群众大会上做了大会发言，北京卫戍部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和北京造反派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对聂的支持曾经有过动摇的蒯大富也赞扬了聂，并且宣称新北大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代表（147）。井冈山兵团进行了辩护，但是他们无法再出版《新北大报》，3月22日，《新北大报》发行了最后一期。聂元梓一派开始抓捕和审查井冈山兵团的成员（148），被抓的领导人遭到了公开批斗（149）。将近四月底的时候，聂和孙

组成了专案组。他们扣押对方的老师和学生并且严刑拷打，进行逼供；他们还将北大的一栋平房改建成监改大院，被关押在内的干部师生时常遭到殴打。井冈山兵团的普通成员则被告知，如果他们倒戈要求对其领导人进行严厉惩罚的话他们就会受到宽大处理，而那些惩罚是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所应得的（150）。到6月底，聂元梓一派宣称总共有1200多名井冈山成员脱离了反动组织，聂在一篇长篇演讲中对这些“叛逃”的人员表示了欢迎（151）。7月18日，聂主持召开了对被抓的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第一场公开审判，会上，被控告的人均宣读了长篇认罪书（152）。

7月22日，聂元梓一派准备进行最后的战斗。他们对反对派占据的楼房实行全面停电、停水，从而引发了一场使用屋瓦、鱼叉和砖块进行的武斗，这些武器甚至飞到了临近的街道上。附近的清华大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械斗，在那里，蒯大富即将对他的反对者实行镇压。7月27日，一支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被派遣到清华，以隔离双方并实行停战。蒯大富的团派对他们进行了攻击，结果造成5人死亡149人重伤（153）。聂闻讯后，紧急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工宣队进驻北大的对策。他们分发莫洛托夫燃烧弹和其它武器并派出了岗哨（154）。然而，7月28日凌晨3点，聂和其他四名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被召集参加紧急会议，愤怒的毛泽东批评他们拒绝停止派系械斗，指责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告诫他们工宣队是由他亲自派去的，工宣队的地位不容挑战。他还告诉聂等人红卫兵运动结束了，命令他们返回校园去接受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155）。

七、镇压

8月19日，军宣队抵达学校后事件的走向发生了极大转变。军宣队492名成员中有200名是来自第63军的士兵。《新北大》马上遭到关闭。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被释放，武斗两派被解除武装并遭到解散。两派领导人就像犯了严重错误一样被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再教育。聂因为支持武力镇压而被整肃（156），并多次遭到群众大会的批斗。反对派的境遇更差：7名学生领导人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157）。

但是北大的文革仍然没有结束。九月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不算前两年的数字，这一期间总共有超过900名干部和教师被拘押在学校，而不管他们是否有派系联系。经过一个月的严厉审讯之后，军宣队宣布有542名在押人士是“人民的敌人”。到了该年年底，18人因无法忍受而选择了自杀。这其中包括崔雄崑，10月中旬他的尸体被人在学校的游泳池里发现（158）。聂元梓则接受了一年多的隔离再教育，只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作为代表才获得象征性的假释。在这次会上，尽管聂还处在隔离审查和批判之中，她还是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11月，聂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才被安排转回北京的工厂。1978年4月，聂元梓被捕入狱，直到1986年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后才被假释出狱（159）。

（未完待续）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20, No. 1, 2013）

【微观历史】

清华文革中两派分歧的一个微观样本
——对物九两个战斗小组的剖析

◇ 引言

1966—1976年，清华大学经历了文革运动，其中，1967—1968年，出现了团派和414派的严重对立，并在1968年4月到7月发生了惨烈的武斗。关于两派的思想分歧和分歧产生的原因，已经有不少论者进行了研究，并逐步深入。其中，有论者从组织来源分析：“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414串联会。”“5月29日正式成立了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认为“414的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时也指出思想分歧是干部问题。（杨继绳：《从清华看文革》，《良知的拷问》第8—9页）。有的论者从思维方式角度进入研究，指出文革时期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倾向”，认为“在清华，团派改变现实的态度更加激进。如果说414反映了群众对文革的极左政策的抵抗，那么团派则多少反映了文革前被压制者的声音”（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第260页）。有的论者回顾当年“第三种声音”的主张：认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其伪装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指出：“全国的两大派，包括清华的两大派，为争夺可能到来的这些权力，不惜杀红了眼。文革初期，本来被认为正义的造反行为，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两大派的丑陋行为迅速脱离了曾经拥护文革的广大群众。”（李仕林等，《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良知的拷问》第179页）

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中，详尽论述了414思潮和团派思潮。指出：“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十七年红线主导论”。“相比较团派所信奉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对文革必要性的否定也是隐含的，浅表的。”但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红线主导”论，孙怒涛提出“要补充一句极其重要的话，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是红线主导，但不是正确路线主导。”对于团派思潮，孙怒涛认为，用“彻底砸烂”“作为团派最核心最基础的观点，是贴切的。”“但是，简单地把团派思潮等同于极左思潮也是不合适的。在团派思潮中还有一部分是：在连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人为产生的差质群体，总体上是一群有独特个性、有独立思考的人。”“团派思潮中同样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这就是追求社会变革、呼唤公平正义的诉求。”（《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第693—694页）

以上论者都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他们经过多年的反思，脱离了简单化的定性，力求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接近事物的本质。

未参加清华文革的较年轻的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认识。历史学者秦晖说：“很多人都说清华文革在全国文革中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义，其实，清华无疑是造反派被利用的典型，广西则是造反派被镇压的典型。两者结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文革最完整的典型”。秦晖指出：文革中的群众造反，并不能仅仅用“奉旨”来解释，它是有社会土壤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值得同情并不能意味着它就是“民主派”（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历史拒绝遗忘》第33页）。秦晖的论述，主要可以看做是对清华团派的评价。而唐少杰教授对414的评论则比较详尽。唐教授指出：“四一四思潮具有丰富、深切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取向，成为清华文革历史乃至整个文革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四一四思潮是唯一一个以文革前的中共意识形态主流为依据的右倾思潮，这种思潮能够在清华出现和传播，恰恰说明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的直接作用和切实影响。”

以上论者的观点拓宽了考察清华文革两派分歧的视野，给笔者极大启发。笔者虽然也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但1967年后基本上是逍遥派，对全校范围的情况了解甚少。本文仅从了解到的本年级（物9）的情况出发，对两个有代表性的战斗组略加分析，为研究清华文革两派分歧提供一个微观的样本。

1，文革前物9的政治生态

要分析文革中学生的思想分歧和行动对立，需要从文革前说起。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3年入学的学生共146名，其中有3名是从高年级因病休学留下的，学制6年，定于1969年毕业，简称物9。工程物理系各专业均与原子能有关，是机要系，除录取分数高外，历年政治审查也很严格。但1963年相对宽松，从家庭出身看，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约占40%，知识分子或职员约占40%，其他为小商、小业主、上中农、资本家等，约占20%。入学后，参观了反右斗争展览，后来又陆续进行了党史学习、形势教育、下连当兵、反修教育（九评学习）等。特别是从1964年起的九评学习和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同学之间的思想差距也越来越大，“先进”与“落后”的分野已经形成。在党支部、政治辅导员中受信任的一批学生干部为主的“先进”分子与所谓“思想复杂”、表现不积极的“落后”分子之间，矛盾已经出现。当然，还有许多是既不“先进”也不“落后”中间分子。

在学习九评过程中，学校和系里按照毛泽东“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号召，较大规模地发展党员，到文革前，在物9发展约15人，其中大多出身为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少数为知识分子或职员家庭。全年级女生仅15人，就有5人入党。能够入党的主要是政治表现好，紧紧靠近组织，毛选学习积极。当时其他同学中就有不服气的种种议论。

学习九评时，按照学校要求，联系个人的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同学们都要“暴露思想”，分析家庭影响，划清界限，其他同学给以“批评帮助”，被帮助的大伤自尊，而帮助人的高高在上，有的甚至乱扣帽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知是谁布置的，讨论起“阶级斗争是由谁挑起的”这一话题，争论十分激烈，有认为是无产阶级主动进攻挑起的，有认为是地主资产阶级挑起的，还有认为是客观存在，无所谓是由哪方挑起的。讨论到后来，认为是地主资产阶级挑起的一派占了上风，以毛的教导“树欲静而风不止”为据，说地主资产阶级是多么残酷剥削压榨甚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必须反击，彻底消灭他们，凡认为是无产阶级挑起的，被说成是“污蔑无产阶级，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而认为无所谓谁挑起的，则被扣上“表面上客观，实际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帽子。通过辩论，加大了对“剥削阶级子女”的歧视，造成政治压力。

此时，城乡四清运动开始，有的同学家长被查出是“漏划地主”、“四不清干部”、“房产主”、“高利贷者”等，消息传来，组织上又要求这部分同学与家庭划清界限，有的还因此被撤销了班干部职务。

以出身好或政治表现好的党团员为代表的“优质群体”与出身不好或“思想落后”的“差质群体”的分野，通过政治学习和组织发展，已经基本形成。这就为文革中的派别奠定了基础。

2，两个战斗组的诞生和对立

1967年初，团派观点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名曰“契卡”。紧接着，414观点的同学也成立了名为“解放全人类”的战斗组。各有10余人。这两个名称，在全校上百个战斗组中，最具有思想理论色彩（另外还有一个叫“巴黎公社”的，也有些理论色彩。其他多以革命圣地地名、主席诗词句子、革命史上的军队番号命名）。

从两个战斗组的命名，可以一窥他们的思想分歧。

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前苏联的一个情报组织，于1917年12月20日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创立。该组织是因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要求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而创立的。捷尔任斯基将契卡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实际上，契卡的主要职能还包括逮捕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契卡于1922年被改组成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别乌），1934年7月改名为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又在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著名的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

当时的大学生知道契卡这个名字，是因为看了苏联电影和读了苏联小说。契卡行动神秘，出手迅速，打击力量无情。物9这个小组的骨干是几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平时读书较多，对历史和理论问题颇有兴趣。他们以契卡命名，已经是在团四矛盾出现之后，以此名称来显示革命的彻底性、坚定性，对反革命打击的残酷性，自以为有相当震慑力。笔者当时对此名称颇不以为然，认为有恐怖意味，会脱离群众，因与契卡的头头是中学同学，故询问之，并希望更名，但其成员很为此名得意自豪，断然拒绝。而物零零年级团派甚至仿照师兄，成立了一个“第二契卡”战斗组。无论是契卡还是第二契卡，均不是团派中的温和派，不仅在口号上而且在行动上都表现得比较极端。

而物9年级414成立的战斗组命名为“解放全人类”，显然来自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原文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所写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所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应该理解为对原文的概括和总结。。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阐述的重要原理之一。

我也曾经询问“解放全人类”战斗组成员此名称的含义，他们毫不掩饰地说，主要是遵循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他们支持《红旗》杂志调查报告，认为清华的干部大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7年里“红线主导”，反对团派的“彻底砸烂旧清华”观点。

这两个战斗组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在干部问题上表现的十分明显。他们通过大字报等方式展开辩论。针对“解放全人类”在干部问题上的观点，契卡成员提出“清华的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社会基础”，是“刘邓的细胞”，这一观点在当时也有相当的震撼力，引起了更加激烈的辩论。由于“解放全人类的”骨干均为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对此无法接受，思想的对立也更加严重。

不久，从1967年春季到冬季，大部分两派成员又外出串联。其中契卡成员有的在江西，有的在河南，积极支持当地造反派，介入了武斗，有的还受了伤。而“解放全人类”的成员则未听说有支持外地造反派的行动。

1968年4月，清华两派大规模武斗开始后。物9多数同学撤离学校。而契卡和“解放全人类”成员则留在校内参加了武斗。并且在战场上厮杀，刺刀见红。

“解放全人类”和其他工物系414占领了8号楼，并改造成战斗工事式的据点，持长矛等武器防守。而契卡成员则驻守在与8号楼西侧不远的新航空馆，监视并包围对方据点，防止对方转移或逃跑。对方于被围困数日后，趁凌晨围困者打盹，弃楼出逃，在路上发生了遭遇战。经双方用长矛激战后，多数逃脱，而“解放全人类”主要成员有2人被俘，后1人被交换俘虏时释放，1人监禁，而看管他的正是契卡成员。

5·30东操场武斗时，“解放全人类”中有1人被汽油烧伤脸部和手部致残。

“解放全人类”中的女生，则坚持在校内为参加武斗的男生做饭送饭。

契卡成员多数坚持到7月27日工宣队进校，并参加了抵抗行动，后见抵抗无效，撤出学校。

3，两个战斗组的组成

考察两个战斗组的成员情况，对清华基层群众的派别形成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以下分别介绍对他们的基本情况。有些人虽不是两个战斗组主要成员，但围绕在战斗组周围，观点相同者，也列在正式成员之后，算作他们的外围。

契卡的成员主要为职员（知识分子）子女，也有少数其他家庭出身的。文革前多为思想活跃，不够安分者。在清华文革开始阶段，多“反蒋”和反工作组，主要骨干曾被打成“蒯派”。后多数参加过“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解放全人类”的成员主要为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也有少数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党员较多。文革前多为追求进步，比较听话者。在清华文革开始阶段，先保蒋，后保工作组，批判蒯派。后有些参加八九红卫兵，没有参加过“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契卡主要成员简介：（为保护个人隐私，用化名）

郑平，职员家庭（母为共产党员，妇女杂志编辑）。工作组时期反工作组，被打成蒯派。因高年级同学给他贴出讽刺性大字报《正传》而出名。喜读书，爱思考。

沈儒，职员家庭，思想活跃，文笔好。

文岳，职员家庭，思想活跃，文笔好。

宋年，资本家家庭，思想活跃，不受拘束。

佟路，小业主家庭，思想活跃，喜文艺演出。

鲁元，女，工人家庭，党员，仰慕郑平，毕业后与郑结为夫妇。

另有其他物九学生为团派活跃者，与契卡观点相似，但主要未在契卡组织里活动的：

方明，职员家庭，党员，井冈山总部委员。

辛云，工人家庭，井冈山专案组成员，1983年被“记录在案”。

路培，职员家庭，井冈山“前哨”广播站播音员。

楚义，小商家庭，在工作组时期受王光美迫害被迫卧轨致残。

程志，职员家庭（父亲是基层供销社干部，四清是被打成“四不清”干部），工作组时期被打成“蒯派”，自杀未遂。井冈山报编辑。

西忠，贫农家庭，文革前个性较强。参加清华武斗并在工宣队进校时顽强抵抗。打出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

牟宇，职员家庭，父母在美国，反蒋，反工作组，被打成蒯派。

“解放全人类”的成员主要为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也有少数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党员较多。文革前多为追求进步，比较听话者。在清华文革开始阶段，先保蒋，后保工作组，批判蒯派。后有些参加八九红卫兵，没有参加过“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解放全人类”主要成员简介：（为保护个人隐私，用化名）

延阳，革命干部家庭，党员。

尹超，贫农家庭，党员（中学入党）。文革初期保蒋，参加过八九红卫兵活动。

简英，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党员。文革初期保蒋，保工作组，批判“蒯派”。

赵秀，职员家庭，党员。文革初期保蒋，保工作组。

祖录，家庭出身不详。

另有其他414观点的，支持“解放全人类”，并参加了414活动的：

金秋，贫农家庭，参加武斗受伤致残。

麦红，上中农家庭，参加武斗受伤。

达因，职员家庭，参加武斗。

纪平，女，革命军人家庭，党员。

许惠，工人家庭，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校广播站编辑，起草八九派声明。

哈贵，工人家庭，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校广播站播音员，播出八九派声明。

田芳，女，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党员，与二姐一兄均为清华毕业。参加武斗。其姐及姐夫亦参加武斗，制作土坦克并灌用系实验室汽油。

由以上统计分析表明，物九团派的契卡及其外围成员，多为由反蒋一反工作组一八八串联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发展而来。而物九414派的“解放全人类”则主要是由保蒋—保工作组—八九串联会—清华大学红卫兵—414发展而来。这与全校其他系，甚至本系其他年级不完全相同。也许，这更加具有典型性。

4，两个战斗组分歧的深层次思考

契卡和“解放全人类”这两个战斗组，在大字报笔战之后，拿起了长矛，披上了铠甲，在战场上厮杀，他们的思想上和感情上何以对立至此？

契卡的名和实都是非常恐怖的，而“解放全人类”似乎温情脉脉。

现在人们知道契卡的历史及其后来之演变，所谓“无产阶级的铁拳”契卡其实就是秘密警察，是专制的工具、独裁者的鹰犬，善良无辜者闻之无不谈虎色变。

1992年9月12日，俄罗斯上映了一部影片，名叫《契卡》导演：Aleksandr Rogozhkin 又名：Chekist。影片透过契卡一个地方领导人之眼，展示给观众一幅幅血腥的图景。影片确实是相当的血腥，一声声的枪响，一具具的尸体，折磨着观众的神经，考验着观众忍耐的极限。这部影片不长，大约只有八十多分钟，场景也很单调，大部分就位于一个看守所的地下室里。但八十多分钟的影片中，其中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是在枪决人；每次都在这个地下室里，男女老少一群人被从囚牢里带到这里，然后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走到门板前，脸朝着门板站立；每次都是同样的五个行刑人，手脚利索地朝着他们开枪射击；赤裸的尸体被头朝下吊上地面，然后被扔上板车拉出城外。整个过程异常的规范，就如同屠宰场。在影片中，作为契卡的人员，他们已经成为杀人的机器，杀人就是他们的职业。最后，一个行刑人企图上吊自杀，而剧中的主角最后亦走向疯狂，而成为这台嗜血机器中的一个牺牲者，成为革命这头怪兽嘴中的鲜血。

物9的团派骨干，对契卡的历史作用并不完全了解，只是从前苏联电影和小说中知道一些皮毛，认为契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表达了他们革命的坚定性。契卡成员的大字报中调子很高，宣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从理论上从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寻找根据。其实列宁早就阐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可以无视一切法律，因而在行动上也可以“无法无天”，任意迫害杀戮不服从他们的任何人。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契卡”小组的成员，当然不能等同于前苏联的恐怖组织，他们只是以契卡坚定的革命精神为榜样，试图在毛的文革大旗下反抗血统论的出身歧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但其思想资源来自列宁主义和毛的继续革命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必然走向失败。

物9年级414派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似乎胸怀十分宽阔。但他们同样是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与团派把目标对准“走资派”不同的是，他们的目标对准的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团派中多数“出身不好”，对党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因而属于“右派翻天”，为此，他们拿起了武器，在武斗现场上与对方决一死战。其中，有的困守宿舍楼几十个日夜，在突围中被俘；有的在“土坦克”中被烧伤毁容。其实，他们的“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主要是要解放干部，这反映了两派对清华十七年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的分歧。他们并不愿解放“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以及十七年中冤假错案中的受害者，也不认为有什么冤假错案，他们基本上是十七年包括文革前“阶级路线”的受益者。“解放全人类”小组成员的口号和愿望一定程度上是善良的，试图维护社会秩序，反对极端行为，但他们是毛和中共多年强调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社会，又不乏曾经得到的社会地位的优越感，所以对反对者不能容忍，也不是通讨论和谈判去解决问题，不惜诉诸武力。他们连自己身边的同学的不同意见都不能包容，又哪里真正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呢？

5，结语

1）物9两派的分歧，不是1966年6月到1967年4月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形成的，而是在入学后的3年里由清华党委实施的阶级斗争教育、反修教育，学习毛泽东著作等一系列革命教育中和政治教育制度下形成的，更可推及上大学前的各种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各自家庭的遭遇和感受。团派多数人，对政治运动的压力有反感和抵触，并有着一定叛逆思想和性格，而在行动上表现过激；而414派，则比较“正统”，在文革前实际上或自以为受到了益处，同时，对清华蒯大富等的极端行为强烈不满，希望恢复秩序。这种思想分歧和利益诉求，在当时是无法调和的。

2) 在理论上, 物 9 两派都在那个时代尽可能地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他们中的一些人刻苦地学习了毛选和马列原著, 试图从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但他们不能也不可能有其他思想资源, 因而仍然局限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范围, 无法发现文革的方向错误。虽然, 他们各取所需, 强调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侧重点不同, 但因都是在这个错误理论体系下思考, 所以实际上是殊途同归, 制造了假想的“阶级敌人”, 不惜与之流血搏斗, 造成了“同室操戈”的悲剧。

3) 走入社会后, 经过几十年的人生历练和思考, 物 9 两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学, 改变了思想认识, 抛弃了过去的恩怨, 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1998 年, 在毕业 30 周年之际, 大家握手言欢, 相逢一笑泯恩仇。此后, 又多次聚会, 亲如兄弟。在改革开放, 引入了世界各国新的思潮之后, 善于思考的一些同学又进行了深度的探索, 有了新的认识成果。可望在放弃了陈腐过时的错误理论之后, 与时俱进, 在吸收了全人类共同的思想理论财富的基础上, 实现新的“殊途同归”。

(作者简介: 张比, 男, 1945 年生于河北唐山。1963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 年分配到水电部一局, 后在吉林市科技局、华北科技学院等工作。2010 年退休。)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 孙怒涛主编,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

# 【史海钩沉】

## 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小报

• 胡庄子 •

红卫兵运动中, 北京四中颇有影响。1966 年 6 月, 四中的学生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升学制度; 四中的刘辉宣创作的《红卫兵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闻名全国; 专供“牛鬼蛇神”唱的《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 歌词也出自四中红卫兵之手; 四中还是名声赫赫的“西纠”的发起者之一, 四中的孔丹担任“西纠”负责人, 李三友是“西纠”13 道“通令”的起草者; 四中的秦晓、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都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名人……

这里重点说说四中红卫兵创办的几份在文革中颇有影响的小报。

### ◇ 《中学文革报》

1967 年 1 月 18 日, 红卫兵运动中最著名的反“血统论”小报《中学文革报》创刊。《中学文革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 其实主办者是北京四中高 3 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和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等。《中学文革报》报头题字是从毛泽东手书中拼凑的, 其中“文”字取《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

创刊号刊登了遇罗克批判血统论的长文《出身论》, 三万份报纸很快销售一空, 一时间洛阳纸贵。2 月, 又以特刊形式印六万份刊登修改后的《出身论》。

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是直接影响一个青年考学、招工、参军、求偶、提干等涉及个人利益乃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出身好，青山绿水，一路风光；出身不好，步步坎坷，命运多舛。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深受其害却不敢言语。遇罗克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出身论》以人“生而平等”为出发点，从“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受害问题”等方面系统批驳血统论。《出身论》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它抨击了血统论和种姓制度。《出身论》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惊心动魄之音。这篇文章像红卫兵运动中的许多异端思潮一样，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使用流行的文革词汇，用正统的革命思想包装自己，却藏其利器，发出自己尖锐的声音。

《中学文革报》以后几期的内容都是批判血统论的。先后刊登了遇罗克的《谈纯》（2月2日）、《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2月10日）、《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2月21日）、《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3月6日）、《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4月1日）等文章，成为批判血统论的主要阵地。

当时红卫兵报刊多达万种，不少具有官方背景。《中学文革报》则是一份纯民间小报。它的出现，起初并没有引起高层注意。1967年2月6日，康生在与师大一附中师生座谈时，有的同学提出：“现在报上刊登的这篇《出身论》，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认为不好，可能将掀起一场大辩论。”康说：“有辩论就好嘛，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思辨能力。”后来，戚本禹批判《出身论》，并说“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潮。”

当时，北京众多的红卫兵小报卷入了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辩论。《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和《只把春来报》等小报，为《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辩护。《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北京评论》等报则严厉批判《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两派小报相互攻击，甚是热闹。

《中学文革报》出版多少期后被取缔？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67年底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 1963年12月—1967年10月》（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说，这份报纸出了4期。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说该报“一共出版四至五期”。

其实，《中学文革报》编号出版第1期到第6期，另外出版了1期特刊。笔者收藏有全套七期小报。

陶洛诵回忆说：“《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抢，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到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就此被迫停刊。”（陶洛诵《我和遇罗克一家》）

需要说明的是，《中学文革报》是文革后最受知识界赞扬的一张小报。

#### ◇ 《只把春来报》

《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主办。其实，它的编辑者是四中的几位红卫兵。当时，许多红卫兵小报都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句话作为报刊的名字。

《只把春来报》也是取自毛的诗句，妙的是一个“报”字，一字双关。

《只把春来报》创刊号有两种，以日期不同区分（刊登内容相同）：一张标明1967年2月23日，一张标明2月26日。这张小报共出五期。

《只把春来报》刊登的主要文章有：第一期：《于无声处听惊雷》、《为什么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第二期（3月12日）：《论出身——批判出身问题探讨中若干错误思想》，第五研究小组。第三期（4月9日）：《从一封血书谈起——将对血统论的批判进行到底》，第五研究小组。第四期（5月28日）：《“逆流”观察家》，3—4版是两版漫画。

这张小报和《中学文革报》是一条战线的，是批判血统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关于《只把春来报》，不须笔者绕舌，有几篇回忆《只把春来报》的文章，生动活泼，都是第一手材料，剪辑如下：

何大明的《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中说：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朵颐。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账。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陞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

陶洛诵在《我和遇罗克一家》中回忆：北京四中的“吴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张育海等人办了个《只把春来报》，张育海写了篇《论出身》，被红卫兵和联动分子说成是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受到《红旗》杂志私下的警告，报纸也就停刊了。”“毛子注定要当冒险家，文革爆发后，他是四中第一个去兰州串联的人。西单商场武斗时他在场，平白无故地挨了粒汽枪子弹，子弹打在右眼眶骨头里取不出来，引起瞳孔永远放大。他要只身去东北，当天找我道别，邀请我到北海公园去划船。游人很少，我们俩泛舟湖面，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桨声与我们的谈话声。‘我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来了。我要把学生证放在死人兜里，让人们认为我死了。’我惊异地喊起来，无论我怎样追问，他也不说他到底想干什

么。……毛子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的伙伴张育海跑到缅甸参加缅共，在一次战斗中，身中六弹牺牲了。”

唐晓峰的《难忘的一九七一》说：《只把春来报》由（四中）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

#### ◇ 《新四中》

《新四中》，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1967年5月17日创刊。

先看创刊号头版头条刊登的《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

“钟山风云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

我们伟大统帅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师百万”，在他老人家决战决胜的战略部署下，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威不可当的力量，摧枯拉朽，直捣刘邓老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灭亡的时刻来到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这决战的日子里，回顾起中学十个月阶级斗争的熔炼，回顾起毛主席带领下走过的光辉历程。革命造反派充满了无限壮志豪情。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听！这就是革命造反派斗争的灵魂。

曾几何时，庞然大物刘少奇，狐假虎威的工作组，耀武扬威的西纠，不可一世的联动，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一切牛鬼蛇神都被杀得片甲不存，抱头鼠窜，统统抛进了垃圾堆，看着这一切。怎能不为革命造反派大声叫好，怎能不为革命造反派高唱赞歌？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势如泰山压顶，形如怒涛澎湃，奔腾而来在疾风骤雨里，在狂飙雷电中。革命造反派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吼声震撼了大地，铁拳砸碎了锁链，要革命，要批判，要造反！

革命造反派拿起笔作刀枪，千百张大字报暴露了魍魉鬼魅的原形，揪出党内一小撮吠日的狂犬。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被踩在脚下了，精神贵族的阶石被粉碎了，什么年复一年的

“高考”，什么“梦寐以求”的大学都见鬼去吧！修正主义的混蛋逻辑我们偏要颠倒过来……。刘氏喽罗的几盆污水，泼不灭革命的烈焰，反动分子的几杯黄土挡不住历史的怒涛。刘家门楼摇摇欲坠了……横扫千军威尚在，刺破青天锷未残！革命造反派不愧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敌人不甘心灭亡，刘少奇拿出了镇压革命的全部伎俩，一时间，阴风四起，乌云遮日，黑手企图扼杀还在摇篮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屈服了吗？胆怯了吗？没有！没有！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那反动对联猖獗的时候，革命造反派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什么皮鞭，棍棒，什么谩骂围攻，什么“反革命”的帽子，什么剥夺政治权利的变相监禁，都挡不住革命造反派一反到底的决心。“严刑利诱奈我何，颌首流泪非丈夫。”你们只能夺走我们的自由，摧残我们的躯体，却永远动摇不了我们始终如一的信仰。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革命是扑不灭的，造反派是吓不倒的！赤潮汹涌，万里奔腾急。看！革命造反派杀向社会，杀向全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英勇批判反动的对联，捍卫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张牙舞爪手持凶刀的牛鬼蛇神闻风丧胆，挥舞皮鞭面貌狰狞的刘邓打手束手无策。革命造反派挣断身上的绳索，冲决层层罗网杀出来了，冲出来了！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那漫漫的征途上，革命造反派是怎样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革命造反派怀念你啊！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有了您革命有了方向，有了您啊人民有了救星！

在黑手伸向革命的紧要关头，在敌人猖獗的危机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朝夕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有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十恶不赦的反动路线死期到了！革命造反派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新的搏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批判！批判！批判！千万枝笔，千万枝枪刺向强敌的心脏，广大革命群众起来了。发动起来了。“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避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了新前景。

英勇的斗争，换来胜利的硕果。革命造反派严正地宣判了风靡一时的反动对联死刑，作威作福的刘氏门徒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血统高贵的绅士们一个接一个滚进了泥沟。幕后黑鬼画皮撕破了，……革命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

在十二月黑风中面对“联动”等阶级敌人疯狂挑衅，革命造反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中央文革，击退了反革命联动的进攻。区区几个小丑，怎能倒转历史车轮，“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中，革命造反派小试锋芒，夺了校内外大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望而生畏。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军政训练里，革命造反派向“私”字英勇宣战，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形成了浩浩荡荡地革命大军。

在阶级敌人自上而下掀起的逆流中，革命造反派没有丝毫地怯懦，浴血奋战，英勇反击，粉碎了“联动”反中央文革、反解放军的逆流。和解放军结下了血肉情谊。

在发动总攻击的红四月里，革命造反派又以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到这场彻底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决战。刘少奇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革命造反派正在前进！

革命造反派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革命造反派豪迈的步伐永不会停止，直到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

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页页光辉的斗争史，回顾那漫漫征途，怎能不为革命造反派而狂歌，而欢呼。每一个激动人心的战斗，都谱写着革命造反派英雄的颂歌。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杀，都记载下“造反有理”的光辉诗篇，千言万语说不尽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唱不完革命造反派立下的不朽功勋。

革命造反派破了最大的四旧，立了最大的四新。革命造反派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革命造反派破的是臭不可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的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造反派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一代新人，是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是文化革命当然的掌权者。

在前进的道路上，革命造反派绝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只有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破私立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大多数同志没有面临过生死威胁，没有受过反革命的迫害围攻，靠着毛主席，靠着解放军较为轻易地夺取了政权，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权”的重要性，不会夺权，不会掌权，不会巩固权。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得权容易，丢权也容易，舒舒服服地干革命是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是我们造反派的天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也牢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教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造反派无愧是历史的前驱，永远紧跟最最敬爱毛主席的造反派无愧是革命的先锋。

道路虽然曲折，前途无限光明，全世界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胜利属于革命造反派！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

这篇文章，有些“发刊词”的意思。尽管有些长，但还算“好读”，尤其是它透露出了大量信息，对我们了解“新四中公社”及《新四中》报大有帮助。

1967年春夏，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样，分为两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中革命造反兵团属于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区别从《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可以看得出来：“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则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

《新四中》报上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本派观点。像第一期上的《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第二期头版的〈关于目前中学运动的六点声明〉、〈中学运动的关键是为谁掌权〉，第四期的〈新四中公社总部严正声明〉等，都鲜明地反映了四三派的立场和观点。

2、批判联动思潮。如：《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见第一期）、《联动反动理论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见第二期）、《评联动反动的唯心史观——联动思潮批判之三》（见第三期）等。

3、批判宣扬“血统论”的小报。如：第二期的《不许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学习5·16通知兼驳〈解放全人类〉报〈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第三期的《迎头痛击在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顽固执行者的挑战——驳〈解放全人类〉的一篇评论》，第四期的《〈湘江评论〉第三期头版文章批判提纲》。

4、发表了《红卫兵组歌》（见第四期）。这个“组歌”，由新四中公社创作，新四中公社和三十九中延安公社联合排演，1967年7月1日正式演出，北京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反响很大，成为“四三派”文艺的代表作。

《新四中》1967年9月28日出罢6期后，再也没有见到踪影。因为它的“名气”比《中学文革报》小、编辑者也没有《只把春来报》几位编辑的传奇经历，文革后没有见到对《新四中》报的回忆，所以对于这份小报背后的故事，我们知之甚少。北岛在《北京四中》中说：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或许，《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等在《新四中》报上发表的“雄文”就是张祥平的作品……

◇ 《原则》、《三七战报》

《原则》这份小报我手头没有。问了几个收藏红卫兵小报的朋友，都没有见到。不能妄谈。

北岛在《北京四中》中谈到这份小报，史料难得，抄录如下：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

另外，北京四中红卫兵参与了《三七战报》的编印。《三七战报》，中学红代会西城区委员会《三七战报》编辑部主办。1967年7月8日创刊，10月17日出版第五期后停刊。该报的联系地址在北京四中。这是“四四派”的小报。至于四中的“四四派”红卫兵在这份小报中所起的作用，因为缺乏史料，还不太清楚，希望知情人站出来说说。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